

ZB27.7

117

2

刘瑞龙回忆录

B09/1.0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年·合肥

B

791886



刘瑞龙同志（1910—1988年）

刘瑞龙同志（1910—1988年）



1980年在苏北如皋红十四军军长何坤烈士纪念碑前。左起前排三为刘瑞龙。



1941年在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陈毅（右二）、刘瑞龙（右三）、曹荻秋（右一）、罗生特（右六）等同志合影



1941年摄于淮北泗县半城：从左二起：刘瑞龙、
邓子恢、康志强、张爱萍、冯定。



1944年8月15日，新四军第四师西征日，淮北区
党委同志话别后留影。左起：刘瑞龙、彭雪枫、邓子恢
张震、吴芝圃。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前夕，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
驻地西王庄合影。左起：张茜、陈毅、刘瑞龙、陈士榘。



目 录

怀念刘瑞龙同志(代前言)	江 彤(1)
一、家庭和学校生活	(1)
二、在通州师范参加革命	(3)
三、参加创建通海如泰红十四军, 投入农民运动 和武装斗争的开端	(7)
四、党的江苏省委给我的培育	(23)
五、在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岁月	(26)
——西上川陕	(26)
——在斗争中学习	(34)
——川陕苏区创建和发展中的主要工作和斗争	(38)
六、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和张国焘的反党罪行	(66)
——打过嘉陵江才知“大搬家”	(66)
——我参加工作队做少数民族工作	(70)
——张国焘制造分裂, 策划反党活动	(75)
——再次北上结束长征	(82)
七、红西路军西征失败始末及我的获释归来	(88)
八、在延安中央党校和安吴青训班	(91)
九、随刘少奇同志东进华中敌后	(95)
——东出潼关	(95)
——挺进豫皖苏	(97)
——开创皖东北抗日民主斗争新局面	(101)

十、在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的六年.....	(106)
十一、淮北根据地特别值得回忆的人和事	(117)
——军民团结骨肉情深	(117)
——彭雪枫同志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26)
十二、解放战争中在华东、中原支前后勤战线上	(131)
附：刘瑞龙简历	(159)

一、家庭和学校生活

1910年10月3日(农历庚戌清宣统二年九月初一),我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县陆洪闸镇。乳名雷惠,学名刘瑞龙。以后在工作中曾经用过的名字有:刘献之、李也萍、石钧、李二、张云生、王大舜、李占魁、张元屏。

我的祖父刘安盛是农民,兼开豆腐店。有田五十亩,自耕,农忙的时候雇些短工。我的父亲刘鹤祥,号恩溥,在同辈中排行第三,开“陆陈行”(收贩粮食和土纱布),二十多亩耕地出租,有房十余间,雇一个织布工,织些土布出卖,是小地主兼商人。父亲先后娶过三个妻子,首娶王氏,无子早逝。继娶崔氏,生二子,大哥应龙,二哥锦龙。崔氏死后,续娶李遂安(淑垣),33岁生我。我出生才70多天,父亲去世,终年48岁。从此家庭经济情况逐渐败落。

父亲去世以后,家里除母亲、大哥、二哥和我以外,还有大嫂葛洁莲、二嫂毛金英,家计由大哥大嫂掌管。母亲、二哥、二嫂和我,都处于被统治地位。吃饭只能坐在灶台边,不能上大桌,受尽欺凌。母亲悲戚,几次想出家当尼姑。

1917年我7岁,入本镇陆洪闸小学。大哥大嫂只供给我衣食和学费,母亲纺纱、糊纸锭、代人刺绣,挣些钱供我零用。母亲是本县西亭一位老儒生的女儿,粗识文字,对我的学业管教甚严,每晚挑灯纺纱,听我复习功课。她的全部希望,是教育我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她常常坚毅、乐观地说:“城河里的砖头,总有翻

身的时候”。母亲的盼望，给我印象很深。她很喜爱弹词小说，常买一两本来，让我复习完功课以后念给她听，她用弹词中的故事苦心教育我勤奋读书。

我和母亲在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得到的只是兄嫂的虐待和歧视。同时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了地主对佃户追租逼债和商人巧取豪夺的情景。在母亲的影响下，由于对家庭的不满，引起了我对当时社会上穷富不平的愤慨。老师陈耀同（号佐墀）同情我的家庭处境，我至今仍常怀念他。

1921年我11岁，转入南通城北高等小学读书。在南通东门龙王桥南街表兄葛松亭家寄宿，放学以后替表兄家做些杂活。表兄葛松亭毕业于南京陆军小学，参加过辛亥武昌起义，失意回家，在《通海新报》当经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求学，不仅文化知识较前有了长进，也开了眼界。

1924年我14岁，考入通州师范。

二、在通州师范参加革命

我的故乡南通，古称通州，物产丰富，商业繁盛，地方工业、文化、交通比较发达。地租、高利贷剥削苛重，历史上多次发生农民、渔民、盐民的反抗斗争。这里离上海很近，去做工、求学的人较多，所以，国内革命运动容易影响到南通。

通州师范是校长张謇(号季直)在1902年创办的，他是清光绪状元，早年入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后主张“实业救国”，兴办有南通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资生冶铁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企业。为发展实业，还创办有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农科、纺科、商科、医科等专科学校和女工传集所、博物苑等。最初他是爱国进步的，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是当时我国成就最大的实业家之一。我初入学时，对张謇十分尊敬，后来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触犯了他改良主义的幻想和利益，他就公然依附北洋军阀，滑到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去了。这引起我的不满。后来我读了他的文集《张季子九录》，对他才有了全面的认识。

张謇是崇古尊经的。但学校几个比较进步的老师，曾选授鲁迅、郭沫若、冰心、叶圣陶等人的作品，图书馆也介绍一些国外名著译本，如《天演论》、《民约论》、《法意》、《群学肄言》等，供学生阅读。这些知识，对我的思想都起了启蒙作用。

我考入通州师范的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发表，全国革命情绪高涨。这年夏天，通师进步学生从永琮、

王盈朝、徐家瑾组织了“晨光社”，团结进步同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三民主义。恽代英同志1925年与晨光社建立通讯联系，作为传播革命种子的一个渠道。后来恽代英同志先后介绍王永琮、王盈朝、徐家瑾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这时我与晨光社的一些社员时有接触，他们给我解释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5年春，我参加了追悼孙中山先生的大会，听到会上宣讲的三民主义，认为这是救国的良方。晨光社的同志，是政治上最初帮助我进步的启蒙者。

但我直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是靠我的表姐葛季膺和她的爱人恽子强。季膺是表兄葛松亭的四妹，子强是恽代英的胞弟。他们在南京高等师范，在恽代英同志教育帮助下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恽代英、肖楚女同志经常向葛家寄送进步书刊，我在表姐家看到《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简史》、《共产国际党纲》、《帝国主义浅说》、《新社会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和《团刊》、《中国青年》、《向导》等。经表姐帮助，逐渐领会其中思想，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觉得它比三民主义完整、科学。

我的姨父顾怡生(公毅)是通师老师，地方公认的学者和教育家。他同情革命，介绍我阅读《新青年》上李大钊的文章、《独秀文存》、日本人写的《自助论》，给我很多启发。此外，我的在武昌师范大学读书的表哥李守章(俊民)，担任了学生会的主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通师同学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的朱铭勋(理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给我以鼓舞。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晨光社成员蒋嘉宾介绍我参加国民党。我曾在家乡附近的棍子街、东马桥宣传三民主义，组织农民协会。

这时，恽代英同志随军北伐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1927年春，代英同志写信给葛松亭，通知我到武汉投考就

学。四月初表兄送我去上海，我第一次看到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情景。那时正值“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去武汉路断，只好折回南通。当时南通仍在军阀孙传芳统治下。南通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6月，左派省党部派邢步鳌同志来南通，组织左派国民党县党部，我被吸收为委员。

这年7月，汪精卫叛变，蒋汪合流反共。子强夫妇被迫离汉回南通，帮助进步青年组织了革命青年社，作为向共青团发展的过渡。我和一些同学参加了青年社。子强夫妇向我们讲述革命大势，介绍青年运动的经验和方法，指导我们学习，给我们很大鼓舞。

这时候国民党打走了孙传芳，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从江南波及南通。南通推行反革命清党，进行所谓“党员登记”，我拒绝向右派县党部登记，继续在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和革命青年社活动。

1929年9月前后，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陆景槐来南通，经过了解，召集革命青年社成员介绍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指出国民党叛变已成事实，青天白日旗已变成白色恐怖旗子，决定撤销国民党左派县党部。说明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党中央“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对革命青年社的成员经过了解，分别介绍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我已确认共产主义是人类彻底解放的唯一方向，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是解救中国、改造社会的唯一道路。由陆景槐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陆景槐同志主持了入党宣誓仪式。当时的誓词是：“实行革命，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牺牲个人，严守秘密，誓不叛党。”从此我以誓词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决心终生为履行誓词而奋斗。

入党以后，省委特派员和县委决定，我担任通州师范支部书记。寒假，党又决定我以工会特派员名义去大生八厂工作，使我受到党的群众工作的初步锻炼。

1928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派黄澄镜(黄逸峰)、彭汉章(汪

世杰)同志来南通，传达中央11月扩太会议精神。不久，黄澄镜、陆景槐同志先后在东台、南通被捕。省委决定彭汉章任南通县委书记。这时我参加了县委工作。以后，县委指定我担任南通城区区委书记。

当时正值南方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苏南、无锡等六县也进行了农民起义，江北的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各地的党组织也在农村展开了工作。这时中共江苏省委农委书记王若飞同志，来南通巡视工作。县委指定我在南通公园(与省委联络处)接到若飞同志，他向县委仔细询问了学校、工厂、农村党的情况，对南通党的工作作了指示，之后即去如皋指示起义的准备工作。“五一”前后，泰兴、如皋农民起义失败。

1928年6月2日，南通县委在南通博物苑开会，被敌人发觉，我和彭汉章、徐秋生、丁介禾、汪钦曾当场被捕，敌人又在八厂逮捕了袁佩玖、袁福生、黄荣富、沈金元等人。因为没有口供，被解送到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我和丁介禾、汪钦曾均无证无供，经南通县委代表黎昌圣(时中)、通师同学蒋嘉宾和我表兄葛松亭营救，于八月宣判无罪释放。

我出狱以后，黎昌圣同志通知我去上海向省委汇报被捕经过。省委听了我的汇报，告诉我们，这次南通的同志被捕，是因为奸细黄道揆告密。我回到南通，省委已派林子和(陈左斋)为南通县委书记。县委决定惩办黄道揆，我们把他诱到江边，乘他酒醉把他丢进长江。

这时通州师范说我是危险分子，把我开除了。表兄葛松亭让我在《通海新报》当校对，我利用这个掩护，恢复了城区党的工作。有一次，我们在报馆附近组织飞行集会，敌人查封了《通海新报》，抄了我的家，因抓不到我，就逮捕了我的二哥刘锦龙。以后县委派我到南通东乡工作，从此，我开始参加了通海如泰地区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

三、参加创建通海如泰红十四军 投入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开端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在长江以北江苏的（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游击运动一度十分活跃。从1928年5月如泰农民暴动开始，至1930年9月红十四军基本失败，前后达28个月。这场游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打击了敌人，撒播了革命的种子。

通海如泰游击运动的火种，是1928年5月1日如泰农民暴动播下的。当时，泰兴、如皋农民在共产党员沈毅、徐芳德领导下举行暴动，提出土地归农民，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引起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主反动武装的反扑。由于暴动队伍缺乏准备和经验，敌我力量悬殊，暴动遭到失败。不久，如皋、泰兴县委在省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恢复工作，重新整顿和建立战斗组织，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反击敌人的白色恐怖。

当年秋末，省委指示成立了南通特区委员会。11月，特委在海门茅镇召开了通、如、海、启（东）、泰（兴）、靖（江）六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检查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部署了全地区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会上，选举范森、韩铁心、王玉文、徐芳德、林子和为委员，据档案记载委员还有刁九、剑波，但我已记不得是谁的代名了。这次会上，还分配了省委运来的一些短枪，作各县组织武装小组的本钱。我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我被任命为南通县委委员。

1928年冬，南通县委的大部分同志，以东五区(即余东、余中、余西、三余、三益)为党的活动中心，以小学为据点，在贫农、雇农、手工业工人和贫苦知识分子中间开展了工作。

南通东乡地主豪绅和国民党的压迫剥削特别苛重，农历年关前，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加紧向农民追租逼债，催粮勒捐，农民饥寒交迫，痛苦万分。于是，县委决定组织农民进行年关斗争。腊月中旬，县委在俞家沟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向农民提出了不完租、不完粮、不还债、不交捐的斗争行动纲领。农民一致拥护这四项纲领，但行动有顾虑。县委在群众中进行艰苦细致的阶级教育，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团结斗争”。县委召集农民积极分子和党员们开会商议斗争方法。会上，大家都说，往常乡里有些人对地主拖租拖债，先是软约软拖，后来一直拖到来年不交，这个办法可以发动大家一齐干。县委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决定就这样干。经过发动，一批积极分子和大胆的农民先拖起来。接着，大家都跟着拖。地主看农民只是软拖，以为可欺，便扬言过了送灶日子(腊月二十三)再不交租还债，城里就派兵抓人。地主的行动使农民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反抗，于是，参加农民协会的人越来越多。农民说：“等死不如硬闯，干吧！”在这种情况下，县委的武装小组便根据群众要求，镇压了当地的恶霸地主俞兆奇、俞兆魁。1929年2月9日(阴历年三十)夜，武装小组镇压了专替地主通风报信的狗腿子马士良父子，第二天又打死了一个最凶恶的地主狗腿子陆大，这就狠狠打击了地主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吓得不少地主暂时缩回血手。农民留下了原来准备交租还债的粮食、棉花，第一次过了一个没有地主追租逼债的快活年。农民看到通过斗争保卫了自己的利益，革命信心更加高涨。县委在斗争胜利的形势下，于1929年2月在仇家园召开了五千人的群众大会，提出了成立南通东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实际上没有能真正组织。我参加了这次大会。

这时，地主纷纷购买枪支弹药，准备反扑，并要求国民党政政府派兵镇压，武装斗争势所难免。县委首先在三益、余中、余东、余西四区组织了四个武装小队，由仇建忠、唐楚云、俞金秀、陈宗恒等分头领导，收缴地主枪支。武装队同时又是工作队，每到一处，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其中仇建忠率领的小队曾攻入八索镇巡警局，缴到手枪一支、盒枪三支、步枪七支。这是南通东乡农民武装斗争的第一个大胜利。他们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武装了自己。在东五区群众斗争的影响下，南通中五区（金沙、骑岸、石港、西亭、四安）和西三区（刘桥、平潮、白蒲）的农民也行动起来收缴地主的枪支。在收缴枪支的斗争中，群众利用春节到地主庄上舞龙灯、跳狮子、讨年糕等形式聚集起来，麻痹敌人，然后突然袭击，收缴枪支。

与此同时，南通的城市工人运动和海门、启东的农村工作也大有进展。如泰方面党的工作，在王玉文、徐芳德、吴亚苏、汤士伦、韩铁心等领导下，也有了恢复和发展。那时我不在如泰，仅仅通过特委知道一些情况。

1929年，通海如泰地区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得到进一步发展。

南通方面，县委领导了春荒斗争、秋收斗争，并进而发展到武装斗争。10月，县委书记林志和被捕，11月，我接任南通县委书记。10月26日，五千余农民群众配合游击队攻打地主巢穴汤家直，处死了恶霸地主汤廉巨。

如泰方面，1929年6月，在如皋县镇涛区周家空田召开了如、泰（兴）、泰（县）三县县委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根据党中央六届二次全会精神，决定加强政治活动，组织群众斗争，纠正部分干部不积极发动群众、单纯搞“经济工作”等错误倾向，要求地区之间活动要互相联系、配合。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特委决定把如泰地区游击队集中编队，指定王玉文、韩铁心、于咸等统一指

舞。8月，党在如皋西乡戈家堡西南的宝庆寺召开大会，由王玉文宣布如泰工农红军成立。

如泰红军成立以后，屡战获胜，人数不断增加，省委派薛衡竞对如泰红军进行整编。整编后的如泰红军为一个大队，下分一、二两个队，由于咸、戴奎分任队长。整编后的如泰红军又连打了几个胜仗。

到1929年底，如泰红军已开辟了南到江边，东到镇涛，西至季家市、黄桥以西，北到通扬运河的大块游击区。南通东乡的武装斗争也不断进展。

军事斗争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群众革命运动。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妇女协会、自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迅速发展。许多地方还提出了成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的战斗口号。广大农民在党的教育下，团结起来向地主豪绅展开斗争。

1929年冬，敌人纠集南通、海门、如皋、泰兴、泰县、靖江六县的反动武装，向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包剿”。11月中旬，国民党派驻南通的十三旅第一团，会同六县警察大队、“保安团”，“搜剿”如泰边境的六甲、水洞口、东燕庄、西燕庄、芹湖、野庙垛、刁家网、季家市、黄家市等地，大肆烧杀。单如皋县县长刘昌言在黄家市一地，就捕去农民四十多人，多数沿途加以杀害。南通方面，敌人以东五区为进攻重点，由汤家直出发，向俞家庄、二十五总、二十七总、三余镇、二马路、三马路、白龙庙一带“搜剿”，屠杀革命干部和农民二百多人，烧毁房屋一千多间，岸头镇、何家园、汤家园等地的房屋几乎全被烧光。

敌人的屠杀，没有能使英勇的人民低下头来。1930年3月初，南通巡视员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曾说到那时的情况：“三益区农民分粮分衣的斗争，动员了成千的农民群众，余西三四百农民在农民协会指导下，不但分衣分粮分草，还把地主豪绅捉来枪毙。余中区的部队到三益区去了，群众照常进行分粮分衣的斗争。”